

MEMO 2016

《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MEMO2016

《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MEMO2016:《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 /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2
ISBN 978-7-108-05879-9

I. ① M… II. ① 生… III. ①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804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MEMO”系列始于2012年。作为我们对时代生活的观察和态度，《MEMO 2016》与此前各年一样，汇编《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全年重要报道而成，藉以盘点一年中的大事件，尤其是2016年广泛受人关注、对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这些专题报道既涉及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趋势，包括我们的身体、精神以及物质和文化的消费理念，也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有着认真的现场观察和独有的立场。

在我们看来，2016年是极为不平常的一年。国际上，英国的脱欧导致全球化出现逆转，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发生的暴恐事件，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换个角度说，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的胜出，也是这一趋势在世界的反映。当然，这也标志着以经济干预和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新政自由主义在诞生84年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所处的亚洲201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区。中东难稳，悲剧人物朴槿惠看来也将步其青瓦台前任们的后尘。对中国来说，经略海洋是我们面临一个新问题，南海问题固然是重中之重，但这绝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至于我国国内，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受到种种掣肘，环境尤其是雾霾问题已是与民生密不可分、迫在眉睫的大事。回到人类自身，以积极的态度、健康的心理对抗我们所处的焦虑时代，学会幸福，已不仅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人类或许正在走向升华与下潜的十字路口，新技术的发展可以让人找到新的造梦空间，虚拟创造出新现实；作为一种新的现象，网红甚嚣尘上，这预示着未来业态的大转换，还是泡沫之巅？人工智能仍在飞速发展，2016年李世石与AlphaGo

的对决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人工智能的力量，而进入2017年，AlphaGo的升级版Master显现出更大的威力。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学习，这对人类不知是喜，还是悲。

作为一种既有文章的结集，《MEMO2016》难免有些杂乱。然而，也如前面各年一样，本次结集一直存在一条主线，即一本刊物和它倡导的生活，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口号，也早已内化为行动，内化为本书收录的各篇报道。相较往年，今年在国际、国内、未来之外，又增加了补遗性质的小文章板块，姑且名之为“Memo more...”，均为值得记住的年度重要事件——因篇幅或议题的性质，压缩成了小文章。《周刊》对生活 and 世界的这些观察和态度，如能为大家进一步思考和探讨问题提供一点帮助，心愿足矣。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6年12月

目 录

英国脱欧：全球化由此逆转

断裂的“环”，英国与欧洲 2

欧洲：一个幻想中的共同体 17

美国之惑：特朗普时代开启

在大选现场观察跌宕选战 30

美国！美国！特朗普的社会动员 33

“新政自由”的危机：一场反传统的美国大选 43

不安的中东：伊拉克三省行走记

沙中之墙：今日伊拉克目击记 52

失去的胜利：美国在中东 63

悲剧朴槿惠：青瓦台的权力与宿命

从朴正熙到朴槿惠，韩式宿命与潜规则 76

搁浅的“新时代”，“朴氏外交”因何三鼓而竭 92

南海博弈：经略海洋与崛起之道

南海之上：中国海洋转型的考验与前途 102

南海棋局：小国博弈与战略选择 112

Memo more...

尼斯恐袭，法国的反恐死循环 120

土耳其：“伊斯兰化”恐慌背后 125

“萨德”入韩：“特殊主义”重回东北亚 132

杜特尔特，强人当道 137

卡里莫夫病逝：中亚启动代际更替 144

晚安，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 150

诺贝尔和平奖，被不断定义的和平 154

当诺奖颁给了鲍勃·迪伦，是颁给了什么？ 159

北京搬离北京：超级首都的解决之道

跨越单中心，超级首都演变史 164

梁陈方案，历史与现实 176

郎平的价值：专业主义的胜利

郎平：全球资源与中国合力 186

中国女排的成长之道 200

网红，泡沫之巅？

网红，智能手机末班车上的焦虑乘客 212

流量变现的逻辑里，网红盈利之道 224

学会幸福：积极心理对抗焦虑时代

- 焦虑的时代 236
- 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 239
- 焦虑是工作的影子吗 253

Memo more...

- 开放小区，治疗城市病? 262
- 云南“盲井村”：隐形的富有和显性的贫穷 268
- 邢台大贤村：洪水里的生死场 273
- 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 282
- 聂树斌案改判无罪的常理 289
- 疫苗失效背后：传播链的“惑”与“祸” 293
- 何处安放你的资产 299

人机大战：我们的对手是未知还是自己？

- AlphaGo 到底有多聪明？——人机大战现场观战记 306
- AlphaGo 背后：深度学习的胜利 319

造梦空间：虚拟创造新现实

- 在虚拟世界里创造现实：奇境漫游与产业地理之旅 326
- 虚拟现实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354

英国脱欧：全球化由此逆转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传统强国，英国诉诸脱欧的决定正在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的风向标。自利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行动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关于“世界是平的”、普遍繁荣和均质社会到来的愿景正在迅速消融。若干年之后，我们或许会意识到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英国脱欧推倒了全球化进程逆转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断裂的“环”，英国与欧洲

1948 年秋天，20 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家之一、德国人路德维希·德约坐在马尔堡大学的断壁残垣中，伤感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欧洲在这一次为击败霸权觊觎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做的贡献，比它在以往历次危机中所做的都要小得多，它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了。”那时节，过去 100 年里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唯一中心——西欧刚刚在一场历时 6 年的大战中损失了 25% 的 GNP 和至少 1000 万人口，法德两国战死的军人和平民总数皆超过战前总人口的 8%，德国还被迫交出战前国土面积近 1/4 的东部省份。法、德、意三个工业国家在 1949 年时的 GNP 之和不及美国的 1/3，勉强超过苏联的一半；军费之和更是只有美国的 13%！

万户萧疏、哀鸿遍野的气氛中，也有人表现出了反常的活跃。1948 年 1 月 22 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对下院的演讲中异常高调地宣称：英国和它在海峡对岸的友邦有必要建立某种“西欧同盟”，在政治和安全上形成一个整体。同年 5 月，英国代表出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欧洲统一化运动大会，并于一年后再度出现在欧洲委员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连在野的丘吉尔也在 1946 年的苏黎世演讲中喊出了“重建欧洲大家庭”的口号。

如此直白而富有预见性的表述，与随后 70 年间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若即若离的表现形成了巨大反差，和今天的断然脱欧之举更是南辕北辙。个中缘由何在？

单从字面意思出发，我们很难窥见英国政治家口中的“西欧同盟”与后来真正成为实体的欧洲联盟（EU）在内涵和构成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德国和法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建立在联邦主义原则基础之上，以超国家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大欧洲是它们恢复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力，并在美、苏两大强国掌控的世界秩序中维持独立性的唯一出路。而独立性对英国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英帝国—英联邦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长期影响使不列颠的国际地位远高过它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与美国在文化认同和战略利益一致基础上建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不具有显著的强制和义务色彩。相比之下，作为战后英国“外交三环”中最后一环的英欧关系从来都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英国的确期盼与欧陆诸国结盟，但他们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以共同利益和有限目标为导向的松散盟约，而不是具备极强控制性和义务束缚的实体化机构。英国希望在“三环”之间保持行动自由，兼沾其利，而不是成为任何一环的俘虏。

多数评论家会用老生常谈的“光荣孤立”传统来解释英国脱欧的心理动因；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逻辑忽视了今日英国与19世纪的英帝国在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和全球利益方面的显著差异，未免过于陈腐。1946年之后的英国并不孤立，它在“三环”之间反复游走、身段柔软，从未脱离精明的战略算计。今天看似突然的脱欧决定，固然在形式上斩断了其中的一环，但前提仍是伦敦与布鲁塞尔在产业结构、移民输入偏好乃至外交布局方面已然出现的一系列分化。在公投后长达两年的脱欧操作谈判中，英国仍将努力确保自己与欧盟在贸易和资本、人才流动方面的互惠政策不被彻底颠覆。与此同时，“三环”中的另外两环也将继续为伦敦提供必要的对冲。英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世界霸主，但“外交三环”的战略弹性和冗余空间使得它不必将欧盟视为最后的依靠：这显然比一句简单的“光荣孤立”更能够解释伦敦的脱欧考虑。

“三环”最初的挫败

对1945年夏天的大部分西欧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安定或和平。他们必须为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殚精竭虑，还要担忧各自控制了半个欧洲

的美国和苏联会为新的矛盾爆发冲突。唯有英国人自始至终以骄傲的胜利者自居——尽管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内阁在这年7月被工党所取代，但克莱门特·艾德礼同样把刚刚结束的战争看成是一次验证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对国际秩序进行良性“治疗”的体验。他希望挟新胜之利，对英国社会和帝国结构进行更平等、公允的改造，对普通民众为战争做出的牺牲提供补偿。换言之，当欧陆政治家为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震惊不已、希望通过彼此间的联合来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时，英国人却认为胜利带来了推行内部改革的良机。双方在追求一体化的迫切程度上从一开始就相差甚远。

当然，艾德礼接手的毕竟是一个出口贸易额不到战前的40%、商船吨位损失过半，连面包也要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丘吉尔为了维持战时货币和物资的流通，把黄金储备和海外资产的50%出售给了美国，还欠下美国和各自治领总计35亿英镑的外债。这使得艾德礼不得不把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的32.97亿美元复兴基金悉数用于还债。但他的确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对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通过《国民保险法》，为男性公民及其配偶提供养老金、疾病和失业保险以及殡葬费；创建国民保健署（NHS），建立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网络；由国家财政出资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对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养老金进行改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口号正是在艾德礼任内第一次提出，并成为随后历届工党政府一以贯之的目标。英国甚至因此被谑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君主国”。

1948年，艾德礼的外交大臣贝文率先提出了“三环外交”（Three Circles Diplomacy）这一概念，倡导在英帝国、英美合作以及英欧关系之间保持兼顾，不偏不倚。尽管在1947年和1948年被迫允许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以色列独立，但通过将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英帝国”改组为更平等的“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伦敦依旧维持了对昔日海外领土的政治影响。而在英美关系方面，英国早早表现出了鼓励美国介入和干预欧洲安全形势，以分担英国的财政压力的倾向。1947年，英国宣布放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军事援助，由美国接手，成为“冷战”的导火索。1948年，又是英国敦促美军对遭遇封锁的柏

林实施空运补给，从而划定了“铁幕”的边界。1949年4月，美国最终同意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改变了其避免承担大陆义务的一贯传统，并在两年内为西欧各国提供了近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在对欧关系方面，英国从1948年起就试图将负责“马歇尔计划”援助分配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扩大为常设组织，并向北欧国家提议建立关税同盟。但当法德两国在1950年着手筹建煤钢共同体并向伦敦发出邀请时，英国副首相莫里森表示了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这一提议在经济上无甚必要——英国的出口商品额超过德、法、意三国之和，工业原材料和粮食主要从殖民地进口——在政治上可能割裂伦敦与华盛顿以及英联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厉行左翼路线的工党来说，在煤炭、钢铁生产这样关乎大量就业人口和工会支持度的问题上与外国政府合作也不符合其政治理念。最终，法国成为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掌控者，英国则身处其外。

从“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诞生之初起，以法国为首的联邦派和以英国为首的盟约派就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分歧。1948年，贝文告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伦敦不愿把自己置于一个决定权由“某位秘书长或某位主席”掌握的国际组织当中，“我们担心从那样的潘多拉盒子里会蹦出特洛伊木马来”。1950年，莫里森在拒绝煤钢共同体邀约的声明中更是公然声称：“一个仅限于西欧的政治联邦，与我国具备多重亲缘关系的英联邦、作为更广泛的大西洋成员国的义务以及世界性强国的利益是无法相容的。”挪威、丹麦和瑞典支持伦敦的主张，他们与中西欧各国的经济关联度较低，当然更欢迎一种目标小而明确、义务和约束力有限的盟约关系。

但同时推行对内高福利政策和对外安全义务的扩张需要以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前提，这恰恰是此际的英国政府无能为力的。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德礼为履行对美国的国际承诺，被迫将福利开支挪用做军费，导致内阁因意见分歧而解体。随后的1951年大选中，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自由国民党联盟以微弱优势胜出，开启了保守党在战后的第一个多年执政期（1951~1964），也是“三环外交”的第一波鼎盛期。尽管保守党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同样无法可想，但他们延缓了工党过于铺张的福利主义政策，以便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调整到巩固联邦体制以及

扮演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上：在丘吉尔心目中，这两“环”的重要性显然更加突出。

不幸的是，两项企图无一不以惨败告终。伦敦在1949年组建英联邦，本意是通过将过去的东南亚、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大洋洲殖民地升格为自主权更大的自治领，来维持上述地区对英国本土的向心力。但在战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地化浪潮中，各自治领领导人很快厌倦了伦敦的家长式“指导”以及包含政治企图的白人移民迁入政策。1957年，黄金海岸（加纳）成为西非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英联邦国家；3年后，尼日利亚获准完全独立；1961年底，获得自治权仅19个月的坦噶尼喀（坦桑尼亚）也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尽管大部分自治领在正式独立之后依然选择留在英联邦架构之内，但他们的初衷是从优惠的贸易政策中获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满足伦敦的予取予求。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不禁感慨：“变革的风一起，我们就会被吹走了。”

更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英美关系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误判。作为唯一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依然领导着一个西方大国的战时领袖，丘吉尔在面对美国领导人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优势。他认定华盛顿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需要英国的中介作用，更揣测美国在中东和亚洲对抗苏联的压力时需要英国的支持。但对已经在欧洲大陆驻扎有数十万武装部队并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与西欧各国建立起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的美国来说，一个多余的中介人反而成了累赘。某种意义上，伦敦要强化自己在华盛顿心目中的位置，恰恰需要通过融入西欧一体化，巩固对德、法等国的影响力来实现，但莫里森在1950年的回绝已经切断了这种可能。

更重要的是，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实施对苏“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之后，西欧盟国的安全政策开始直接影响到美苏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华盛顿固然愿意在苏联入侵西欧时为“北约”成员国提供核保护伞，却也担心盟国的自行其是会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在这方面，对虚幻的“全球利益”期待过高、摩拳擦掌不断的英国恰恰是头号嫌疑人：后者在非洲和中东的一系列强硬表现表面上是在分担美国的义务，实际上却是希望华盛顿为伦敦的利益火中取栗，为英国的行动自由做担保。1954年，当丘吉尔的继任者艾登决心以武力回应埃及

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举动，和法国、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动武之后，英美之间的分歧终于彻底公开化。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英国被迫撤军，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府受到的最严重的外交羞辱，它不仅导致了艾登引咎辞职，也使“三环”中最重要的一环陷入了危机。艾登的继任者麦克米伦在那一年的日记里写道：“过去的努力正化为乌有，我们的内外政策已陷入危机。”

“特洛伊木马”

哈罗德·麦克米伦并不是一位大刀阔斧的革命家，但他比两位前任更能认清现实：英国的经济总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被西德超越，它的全球义务和它对西欧的心理优势已经与它掌握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纵然心怀不甘，也必须壮士断腕。1957年，麦克米伦内阁发表国防白皮书《不列颠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宣布英国武装力量总人数将由此前的68万人大幅削减至40万人，其中优先裁撤常驻海外的部队，代之以周期性巡航的舰队；包括航母在内的一系列军备采购项目也被向后推迟。该“白皮书”同时还确认：以后除去出于道义，或被邀请，或为了确保英联邦框架之内的安全义务，否则英国将不会越过“北约”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也是在麦克米伦任内，不列颠完成了它和昔日帝国光荣的最后告别：从1960到1971年，英军先后撤出塞浦路斯、也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将维护地中海、波斯湾和西印度洋航行自由的任务完全转交给了美国第五、第六舰队。东南亚方面，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均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独立使英国真正与东方脱离，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它从经济规模和利益分布上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了。

但这项转型还缺少最后一个步骤，那便是与主要由法国领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展开正式合作谈判。但伦敦想要的依然只是一个有助于复兴英国经济的工业自由贸易区，对政治义务和超国家共同体兴趣索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试图继续玩弄古老的均势战略（Balance of Power），首先

将一部分贸易国聚集在自己周围，随后以此为筹码，与巴黎和波恩讨价还价。而英方仰仗的资本便是在1960年组建的欧洲自由贸易组织（EFTA）。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自由贸易组织是伦敦希望实现的那种一体化类型：简单，明确，除贸易政策外再无其他附加义务。加入这个组织的包括奥地利、瑞士、丹麦、瑞典、挪威和葡萄牙，后来又加上了爱尔兰、冰岛和芬兰。与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德两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规模相对较小，不容易享受到共同体在西欧一隅改善彼此间交通和贸易条件带来的便利。但它们几乎都是小而高效的农业生产国，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对法、德等国推出的共同农业政策相当感兴趣。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说，它们的加入也会是有益的补充。但英国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用心：对致力于输出工业制成品的英国企业来说，单靠欧洲自由贸易组织的那些北欧和阿尔卑斯国家根本消化不了英国的出口份额，这一切只能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才能实现。

1961年7月，麦克米伦内阁第一次向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提出了入会申请，紧随其后的还有丹麦、挪威、爱尔兰三国。但他们碰上了一个足够强硬对手——3年前重返政坛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后者与莫内、舒曼等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缔造者不同，对超国家共同体的可能性心存疑虑。但戴高乐试图使欧洲共同体真正保持在美苏两极之间的不偏不倚，并成为法国重回世界舞台的倚仗。而一个带有显著亲美色彩的英国率领一群小国加入，无疑会使欧洲在外交政策上的偏好向美国倾斜；更何况此际英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法德两国的一半，伦敦对巴黎的需要程度远大过能给后者带来的好处。于是，戴高乐用13年前贝文评价欧洲一体化构想的那句话回敬了英国人——“他们就是美国塞进欧洲的那只特洛伊木马！”

偏偏英国人一直在以实际行动为这句话提供注脚。1962年12月，主要是出于财政考虑，麦克米伦在巴哈马的拿骚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双边协议，决定放弃研制国产海基核导弹，改为采购美国的“海神”型；在此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在使用美军提供的MK-5型原子弹。《拿骚协议》虽然不会使英国的核武器完全落入华盛顿控制之下，但“海神”导弹的零部件供给和火控系统维护完全由美国操纵，英国政府须对使用该导弹的情况提前向美方做出说明，还要向美军核潜艇

开放苏格兰的基地。对历来主张欧洲核武库独立、避免为美苏所左右的戴高乐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公开挑衅。1963年1月，他在盛怒之下否决了英国加入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伦敦的回应则是在同年8月与美苏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针对法国的意味昭然。

第一次入盟申请被驳回之后一年半，保守党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劣势不敌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开启了战后工党的第二个执政长周期。从那时起到1979年，除去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执政的一届任期（1970~1974）外，工党一直以奇迹般的微弱多数优势维持着对下院的控制，并继续那项在13年前夭折的福利国家试验。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完全失败的尝试：重新启动的国有化进程导致大企业生产效率下降、浪费增加；不适当的高福利政策使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到每年140亿英镑；但为了实践“科学革命”和“工业现代化”的竞选诺言，威尔逊内阁又严格控制工资增长幅度，引发了1966年的海员大罢工，使英国的外贸出口额在那一年骤降了36%。由于和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又无法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英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从1963年起连续出现入超，到1968年已经造成了37.78亿英镑的累计赤字；而英国的内外债务到1969年为止已经分别膨胀至308.4亿和99.35亿英镑，状况岌岌可危。

身处风口浪尖之上，威尔逊再度把加入共同市场当成了挽救经济困境的良方。1967年5月，英国第二次偕挪威等国提出了“入欧”申请。此时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已经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EC），巴黎负责政策、波恩掌握财权的结构基本成型，戴高乐当然更不愿接受一个处于衰退状态的英国。当年11月，他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威尔逊：“英国刚刚因为国际收支危机宣布英镑贬值，弱势英镑会给欧共体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英国重返欧陆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与一连串夹杂着希望和恐惧的复杂事件共同到来的。1970年，出身平民背景、关心国际事务的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成为新任首相，他试图修改威尔逊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舰队的决策，并和欧洲共